

忠王李秀成苗裔

张超坐记 简又文跋 黄汉超收集

编者按：英王陈玉成与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两大支柱，是本县从事农民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实践的伟大先驱者，其可歌可泣的事迹震动世界。他们牺牲后其家属和后裔如何？不但藤县家乡群众关心着，而且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也关心着。本刊第五期已发表《英王陈玉成的两位夫人及其后裔》一文，现再将黄汉超同志收集的《忠王李秀成苗裔》及《跋尾》（原载《金田之游及其他》）和《湖南宁乡发现忠王李秀成的七星剑》等文一起刊登，以饕读者。

忠王李秀成既为曾军所俘，曾文正公亲自提讯，取得亲笔供词后，满清政府令其解京正法。曾公敬李为英雄，不欲其解入京，受满清无谓之侮辱，乃与幕府诸人熟商，即在南京将其毕命，而以（李素得人心沿途难于照料）为词入报（此言余闻之于曾君和，名广奎，即曾纪泽之子袭侯爵者，英国伦敦大学生，民国八年歿于长沙）。忠王之子（偶忘其名）亦同时被获，年甫十余，曾公以托之陈右铭先生（名宝箴，江西义宁人，即诗人陈三立先生之父，为戊戌政变重要人物），囑妥为保护，以存英雄后裔。陈氏时以道员佐曾幕，因送归其义宁原籍乡间，并命子三立教其读书，且为之

娶妻，生一子名国卿，稍长即置家塾中读书。陈氏乡誉甚隆，外间无疑之者。忠王之子不幸早死（年二十余在清光绪十七八年间）。右铭先生于丁酉四年（光绪二十四年）巡抚湖南携国卿入湘。陈氏在湘倡办新学，王首开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以其诗友宁乡廖笙阶主持矿事。念国卿以家世关系，不能出应清廷考试，而又欲使能自活，因以托之廖，委为矿务局司事，即成家于水口山（其妻似为陈姓，亦江西人，与笔者同学罗君筱誉有关连，执笔时偶忘其姓）。国卿任事，负责耐劳，为历任长官倚任，矿局入民国改为官办（前清为绅办），先充办事员，后升为课员。民国二十二年，以年老致休。长官知其为忠王之后，即委其子锡洪为该局科员，俾资养老，旋于民国二十九年调充桃源县冷家溪金矿局会计室科员，三十年随该会计室主任陈明远往滇缅公路服务。最近动态未详，当仍在滇缅路局。至国卿现仍全家居水口山矿局附近，年事虽高，精神尚健，笔者与国卿虽无雅故，但因先祖曾为陈右铭先生幕僚，廖笙阶先生又为同乡前辈，故知其详。国卿所存忠王遗物无多，仅有长剑一口，战袍一袭，及忠王供词一本（但非亲笔原本，原本现存曾若农处。若农为曾文正公曾孙，抗战军兴后，将其家重要文献悉运九龙收藏，忠王供词与焉。九龙失陷，若农只身间关归来，此物不知尚在人间否。笔者在二十年前，曾得辗转借读，大段与官书及仿本无甚出入。惟入后颇作哀怨及希冀释放俾收拾残局之词，有曾文正公亲笔删改之处。此稿若据实宣布，颇有失忠王见危授命身份，足见曾氏之用心也）。笔者服务于湖南省建设厅二十年，无机会至水口山，不获与国卿考询忠王遗事。简又文先生以搜罗太平天国文献为己任，展读其《逸经》刊布诸稿及最近《金田之游》，知其用心。若能亲来湘

南水口山一唔国卿，详细考询，必有重大发现。且国卿年届古稀，设一旦溘先朝露，子孙昧于先人典型，年湮代远，将要无可稽考，实为史料重要损失。又因国民政府曾抚恤洪杨先烈后裔，国卿以忠王嫡嗣，竟无人为之表彰，笔者曾屡向当道建言，亦一笑置之，此则尤所望于又文先生者也。

跋 尾

承《扫荡报》总编辑钟期森先生转来湖南张秋尘先生所记《忠王李秀成苗裔》一篇，盖因读拙作《金田之游》偶述于忠王后裔所闻数言而详书其所知见告者。语重心长、良可感矣。兹以原文发表上方，并以个人关于此问题之其他闻见种种书作跋尾，以供参考。

忠王后裔尚存一事，就余以前所闻，除《金田之游》所记王渊（绍楨）先生述辞外，尚有两传说。一则多年前在粤闻从化县有李姓者自称忠王后人。当时曾托县长李务滋先生就地访查，旋得其复函详告采访所得。惜原函仍存香港，内容未能记忆，惟其时个人印象，则以为其所言过于浮泛，不敢置信也。

次则于前月赶柳州采访时，遇陆选之先生，据云：建国二十九年、沐阳有一九十余岁老翁自云是忠王嫡子，南京破时伊年方十一岁，忠王被捕后为曾国荃炙治疾病，国荃愈后暗释之而以貌同者代受刑。王于是率子逃至沐阳，籍行医教馆为生，以终千年，其子为农夫，不大识字，但能畅言太平军事迹，且知金陵各王府所在。并言其长兄为幼主所杀云。陆君又言，此事经由江苏民政厅长王公典先生撰文记之，刊兴化《文化周刊》第一期。是说可谓离奇之甚。因言者凿凿

其辞，且有亲见其人者撰文发表，当是（事出有因）足为吾人将来考察之对象也。

其见诸近人著述者：则有湘人李抱一所编《李秀成年表》末云：“湘中传称曾文正公最重秀成，宥其两子，以一属诸浙江某人，一属陈右铭宝箴。孙名国珍，今犹在湖南宁乡（予曾详记其生平）。”又《太平天国野史》云：秀成之子见诸文家记有三：一名徵祥，尚幼，钱塘某富室收养之。当出险时，金无所取，惟怀秀成所著《天国宝鑑略宝录》一册。一子在江西，与后主同被擒，以其初幼未下狱，后不知所终。一子于兵燹后卖卜于金陵城南，城中居民多识之。盖已获而潜纵之者，亦录之以备一说。又王定安所撰《求阙斋弟子记》（卷五）云：“李其祥，秀成之子，同治三年获于江西，以年幼，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据上述记载，足与张君本文所记互相印证。李抱一所言，忠王孙名国珍（即国卿）今犹在湖南宁乡，尤与张君之文符合。《野史》与《弟子记》所载在江西被擒之幼子而不知所终者，未悉即是属陈宝箴者否耳。其他传说的一子或二子，以未获他项确证，不敢置可否。推张君本文则证据凿凿可考，又经李抱一撰文详记其平生。则其人其事复奚疑焉？至篇末建议抚恤或表彰忠王嫡嗣之责，则余以为忠王桂人也，广西省政府颇向注意于太平天国革命史之阐扬，当以此责属之。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于桂林

宁乡发现忠王李秀成的七星剑

(见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南日报》)

最近，在宁乡发现太平天国忠王的一把双合七星剑，以及李秀成的儿子李容发（又名煦乡，太平天国负责粮草供给的将官）用过的一个墨笔瓷洗。它们是该县南田坪公社民主大队社员赵宗仁和唐齐礼分别献出的。这些文物现已交由省博物馆保存。

这把双合七星剑长71.08厘米，剑身（不连柄）长55.8厘米，剑鞘漆黑色，用竹制成的，鞘尾部缺（应有三寸长刻着花纹的铜箍），鞘靠格处镶有一寸半宽刻有卷草花纹的铜箍，鞘身三根窄铜箍，仅有二根，铜剑格是几字式的已缺，铜剑首是四星如意，双剑柄缺一个。剑冶炼钢质较好，装饰一般，鞘箍刻的花纹图案和太平天国其他文物图案对照，有相同的特点，经鉴定可为太平天国时代的遗物。

这些文物的发现及鉴别情况是这样的：水口山矿务局退休老工人李楚望，青年时曾和李秀成的嫡孙李国钦同过事，熟悉李秀成的后裔在宁乡落籍和珍存七星剑的情况。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写信给耿飚副总理，反映情况，要求及时搜集上述文物。在耿飚副总理指示下，水口山矿务局派人作了初步调查。接着，省博物馆派出专人到宁乡南田坪公社李秀成后裔旧居地土墙湾一带，进行为期十天的调查访问，终于找出了这把剑的下落。这把剑由李秀成的后裔保存，一直传到第四代李锡洪。他死后，由其妻保存。一九五二年民兵收缴各种兵器，她将这把剑交出。以后，这把剑落到赵宗仁手中。在这次调查中，还找到了李秀成第五代后裔李湘静，并发现李秀成的儿子李煦乡及其妻的一块墓碑。

苏东坡在藤州

周 国

林克武同志于一九八二年秋，来我县检查视察工作，曾登访苏亭，并即兴书怀：“逐客归来莫叹嗟，文光万古照天涯；藤州自立东坡阁，也放河阳一县花”。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林克武同志在这里同情并安慰了苏东坡。虽然受到了当时权奸谗口，被朝廷贬谪流放远方。而正是由于流放，使自己的文才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像藤州这样偏僻的穷地方，也得到苏学士的文才俾益而万古照天涯。苏学士该自慰而不该叹嗟了。

苏东坡被流放海南期间，曾两度路经藤州。第一次，是宋绍圣四年（1097），其弟苏辙亦同被流放雷州，是年五月十一日，兄弟相遇在藤州。第二次，是宋元符三年（1100），东坡北返，于八月底又达藤州。九月中旬，东坡取道苍梧，离开藤州北去。苏东坡在藤州停留虽短，但却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对后来藤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松如迁客老，酒似使君醇。系舟藤城下，弄月潭江滨。江月夜夜好，云山朝朝新”。这是他贬谪海南，路经藤州的某天晚上所作。苏东坡当时身处逆境，但他泰然自若，毫不在乎，对前途很乐观：江月是好的，青云山永远是新的。

他在《江下夜起对月赠邵道士》中说：“江月照我心，

江水洗我肝。端知径寸珠，堕此白玉盘。……相将乘一叶，夜下苍梧滩”。苏东坡在离别藤州的当晚，对当地“石壁秋风”、“浮金夜渡”、“文岭云环”、“东山夜月”等胜景，留连忘返，不忍舍去。尤其“东山夜月”，使他无法忘怀，留下了“端知径寸珠，堕此白玉盘”的美句。

藤州民众在宋孝宗淳熙年间，建造“八贤祠”时把苏东坡崇祀祠内，以彰文杰。清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又在浮金亭山麓，营建“访苏亭”，使苏东坡在藤州的足迹永不泯灭。

秦少游在藤州

黄汉超

公元一一〇〇年（宋元符三年）八月十二日，北宋文坛上的一颗璀璨的星斗陨落了藤州（即现藤城）。这位被苏东坡誉为“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的一代词人，曾在藤州居住旬日，“寄情山水，煮酒吟诗”。游览了藤州的“流杯桥”、“江月楼”、“光华亭”等地，并品尝了藤州城外西南面最佳的井水“玉井泉”，最后病逝于光华亭上。秦少游为什么游览这些地方并在那里留下了诗词？上述地方又是现在的哪里？深入研究这些，对秦少游在藤州的活动和宋代的藤州风景名胜及其历史变迁可获进一步理解。

宋代的藤州州治位于现在的藤城，由于它地处浔江和绣江合流之处，系水路交通要道，自唐代以来，京师官员被谪海南，大部由湘江经灵渠沿漓江到梧州，转浔江乘船转入绣江，溯绣江而上容州，再由陆路经北流之“鬼门关”出雷州半岛而往海南。

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苏轼从广东惠州被再贬到儋州宣化军安置，与其幼子苏过路经苍梧，得知其弟苏辙也贬雷州，并已南行到达藤州，便从苍梧赶来藤州与其弟相会。途中还写了一首《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将追及，作此诗示

之》的诗：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

孤城吹角烟梅里，落日未落江苍茫。

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

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黄颊如君长。

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五月一日，苏轼与弟苏辙及其子苏过相遇于藤州之“江月楼”（按嘉庆《藤县志》载：江月楼在城东横街，俯临绣江，宋绍圣间苏轼登此有记，秦少游赏留题焉，即今之东门楼）。苏轼兄弟叔侄三人，在藤州住了一个多月，游览了河东之“流杯桥”及东山等风景点，然后与苏辙同行到雷州而别。

秦少游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遇赦北还，八月初到达藤州。他首先到的地方，就是他的师友三年前被谪在此相会的“江月楼”，然后又到“流杯桥”步苏轼和苏辙游过的地方。秦少游在藤州这样做，很可能出于对苏轼和苏辙的怀念。他的《江月楼》诗云：

仙翁看月三百秋，江波日去月不流。

肯因炎尘暝空洞，直与江月同清幽。

苍梧云气眉山雨，玉箫三弄无今古。

九天雨露蜃蛟龙，琅玕长凭清虚府。

秦少游在江月楼题诗后，步苏轼之后，往河东得甯坊游“流杯桥”。相传此桥为唐初宣抚采使失金杯于此流出而得名（经查在现水泥厂朝县城往西走约五百米处）。秦少游在

此留下“曲水分山阴，與梁胜溱洧。一咏见高风，驷马安足取。”之句（见同治《藤县志》）。

秦少游在藤州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光华亭”。据同治《藤县志》载“光华亭在县东南，与浮金亭对峙。秦少游憩息其上”。（即现县武装部一带）。宋时，光华亭是藤州有名的景点，她面向东山，背临高阜。亭下绣江流水，清澈如镜。登亭远眺，东山林木苍蔚，花果丛生，嵯峨峭壁，古松倒悬。每当旭日东升，红霞贯天，山曦壮丽，使人心往神驰，醉迷佳境。秦少游的“光华亭”诗：

霞通海天曙，月来东山白。

共是凭栏人，谁足当秋色。

记录了秦少游在光华亭上与众早看晨曦，夜观月出的心境，赞颂了藤州东山风景的雄伟壮丽。

秦少游的《玉井泉》诗：

云蒸昆山液，月浸蓝田英。

临风咽沆瀣，满腹珠玑鸣。

这首诗指的地方就是现在藤城中心校的原西涧冲旁。清嘉庆《藤县志》载：“玉泉井在城西南隅，秦少游诗中有涵云注玉之句尽指此也”。此地历称“西涧清泉”流出泉水的山叫文岭，古藤州八景的“文岭云环”即指此山。古时山上苍松翠竹，长遍山巅。山顶常有五色云气周围环绕。玉井泉的泉水清澈见底，秦少游的“临风咽沆瀣”之句就是看到泉水中的蒸气迎风而上写出来的。

八月十二日，秦少游再次出现在光华亭上为客人背诵他在梦中所得词《好事近》：“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天矫转空碧。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诵后口渴索水。水至，却一

笑而逝。

秦少游在藤州病逝后，消息传至湖南长沙。昔日曾以身许秦少游，与秦少游一别数年的长沙女郎（史载不知其姓氏），不惜艰苦赶至藤州“拊棺绕之三周，举声一恸而绝。左右惊救，已死矣！”（见《秦观研究资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宋人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二也有记载）后人羨此女对秦少游忠肝义胆，将其葬于藤州之东山立碑为义女墓（嘉庆《藤县志》作二女墓）。

秦少游在藤州病逝消息传至苏轼处，适苏轼遇赦北还，正从廉州走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县）。他叹息地说“少游不幸死于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黄庭坚听到秦少游病逝于藤州后，也很悲伤，写了一首纪念秦少游的诗：

闭门觅句陈无已， 对客挥毫秦少游。

正字不知温饱味， 西风吹泪古藤州。

直至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5）秦少游的儿子秦湛才将少游的灵柩迁葬于无锡之惠山。

忆政协委员何克夫

韦振林

1984年9、10月之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藤县第二届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在新增补委员中有一位82岁高龄的农民，他便是天平乡新马村的何克夫委员。他中等个子，身材厚实，步伐稳健，目光有神，谈吐文雅，举止有礼，他的出现，颇引人注目。

× × × ×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清风，吹拂净尽1950年秋天无端蒙沾于他身上的污垢，他得安然无恙地从教养场回到家乡来。1952年土地改革时期，他家人已全部外出，因而没有分配或留给房屋。此次回来，只好借居于旁亲晚辈的陋室之中。然而，他却十分高兴。有些人在议论，他三个儿子在外工作，都有一定的工资收入，无论跟随谁过日子，保障衣食无缺，住可安居，病有所医，千老百大，还回老家过着农民式的自营生活，何异自寻苦吃。可他偏偏与别人所想的有所不同，你认为是苦事，他却认为是乐事呢。

行装甫卸，歇息不过一刻工夫，他便向当年（1940）建立起的“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走去，虽然他已知道纪念碑于1958年被拆毁，说是要用其砖块去修建学校。待他到纪念碑旧址一看，地盘已被划分为一畦又一畦，分给社员

们种蔬菜了。他在菜地周围慢步绕走一周又一周，默默地细想一遍又一遍。的确，百年大计在于树人，兴建学校十分必要，但为什么一定要拆下纪念岳飞式的民族英雄的碑塔砖块去修建学校呢？这是值得的吗？这是应该的吗？他脑子里泛起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他回想起1940年建立“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时的情景。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战争的第三年，沿海地区及主要交通干线地区差不多全沦陷于敌人手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奋力抵抗，使敌人觉得力不从心，有顾此失彼之虑的时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互相消耗对抗的艰苦时期，为了进一步扩大培养地方上不便外出求学的青年学子，里人中的教育界先驱何杞先生首先倡议，把当地原有的开明小学升级办成开明初级中学，以应需要。何杞先生的倡议，立时得到当地有识之士热烈响应。这样，又使得沿海地区西来的教育界人士获得栖身和工作的场所。既有生源，又有师资，开明初级中学便这样办起来了。

国难当头，日寇亡我之心不死，读书救国很自然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立志所据了。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出生和成长于学校所在地新白马村，以故里英雄人物为榜样来勉励青年学子，其意义是何等积极！于是，“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在建校的同时亦建立起来了。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外来的师资亦次第返回原籍，开明初级中学遂告停办。然而，五年来所造就的学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成为小学或中学教师。有一部分人成为国家干部，也有人成为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经济师。纷纷报国效劳，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些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当年

学生，在来信中也常常提问及纪念碑之事，真是记忆犹新。可见袁崇焕的光辉业绩确应流芳后世的。

何克夫先生家居时期，只要一有机会，就像数说故乡掌故那样，向小学生、中学生及青年民兵娓娓地讲述袁崇焕英勇反抗侵袭，保护人民的光辉事迹。他讲得引人入胜，激起青少年的共鸣。

1984年清明节后，有一艘从梧州方向回航武宣县的机帆船，内载有数十架衣车和单车，航行至新马村江边东侧大湾处，不幸触礁沉没。新马村群众闻讯，顾不上春寒未退，熟水性者及时划艇或涉水前往抢救，使人物全无损失。被抢救过来的人登岸后，有人送给衣服保温，有人送给姜汤驱寒，有人送饭以充饥……船主和货主感激不尽，赠给报酬，大家谢而不取，后来送给镜屏和锦旗都收下了。这一起具有雷锋式的善事，是何克夫先生亲自参与组织和指挥的。

尽管何克夫先生已年近八旬，而日常生活一向坚持自理，若非天寒地冻或雨水淋漓，他每日都自挑用水，自采柴火，特别喜欢在村边或屋旁可以利用的处所种上树木或花卉，以美化环境。他坚持天天打扫庭除，清除污水，防止蚊虫滋生，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户户都照样栽花种树和清洁环境，后来大家又集资购买水泥，把村内主要街道铺成水泥路。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实属罕有。这便为新马村后来被评为“文明村”创造了良好开端。

× × × ×

1980年9月18日，《广西日报》第三版上登载有《横戈原不为封侯——纪念袁崇焕逝世三百五十周年》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的明清史研究者阎崇年。该文有“袁崇焕广西平南（祖籍广东东莞）人”和“在平南白马圩矗立起‘明督师袁

公故里’纪念碑”之说。何克夫先生阅读之后，立即致函作者，说明袁崇焕的祖父于明嘉靖年间迁居至广西省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村落户，而袁崇焕本人经藤县县试入学，后中进士，再而官至三边总制和督师。而“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并不是在平南白马村矗立，而是矗立于藤县新马村中心校左侧江边。这些情况，引起了作者的重视。1981年6月，藤县县志办的邱德盈和周芝德两人专往北京去，得到阎崇年同志的帮助，在孔庙（首都博物馆筹备处）看到明清两代的进士题名碑。在“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的题名碑上，第三甲第四十名刻着“袁崇焕广西藤县”字样。这一客观历史证据，证明了何克夫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

从此，何克夫先生与北京的阎崇年交上了朋友。后来，阎崇年亲自来藤县新马村访问和调查，何克夫先生全力给以帮助，不管天色如何，他都亲自引路去看袁崇焕的祖坟，寻找其族戚，爬山涉水或远去他乡，都在所不计。

1983年，藤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确定拨款重建“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于旧址。何克夫先生闻讯，欣喜万分。于是，他成为一位特殊的筹建委员。他，反复动员说服分得原基地作为自留地的人把土地退出来，供重建纪念碑之用；他，动员一些青年民兵义务代搬运建筑物资；他，还动员家有原木料的人把材料借让出来供搭支架之用。如此，重建工作顺利开展，于年终如愿完成任务。这便为于1984年6月在藤县迎接各地史学界专家、学者聚集进行袁崇焕学术讨论会创造了一个必具的条件。届时，何克夫先生还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作了书面发言。

×

×

×

×

何克夫先生对袁崇焕如此熟悉和热爱，除乡亲故里感情外，还因他本身就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军人。

他出生于1902年，其时，中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他从青年时期，便立志要当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的军人，拯救祖国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1925年，他毕业于广东陆军学校，翌年即投身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任排长职。在攻打惠城战斗中，由北门转战至西门，爬越城墙而进城，因夺城有功，升任为连长。旋又参加北伐，不幸中途患病，退回后方留医，未能成行。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军强占我东北三省。全国抗日呼声响彻云霄，他出任梧州市抗日义勇队副总教练。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又大举侵犯我大上海，在忍无可忍之下，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英勇抵抗，拉开淞沪抗日序幕。他辞去抗日义勇队副总教练之职，毅然请缨杀敌，直奔淞沪抗日前线。先任敢死大刀队队长，率伍乘夜突袭敌营，出其不意，致敌重创；继而在淞沪要塞司令谭启秀手下任参谋，曾率队阻击敌人登陆，战斗十分激烈。因伤亡过重，后援不继，吴淞遂失守。由于蒋介石热衷于内战，反共反人民，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我十九路军抗日救国壮举，最后不得不退出淞沪战场。他跟随十九路军队伍转移入福建省，任营长，隶属于谭启秀师。1935年，福建成立人民政府，高举反对独夫蒋介石的旗帜。蒋介石恼怒万分，出兵围攻，实行军事镇压。此时，他任团副，奉命率队驻守南平和古田等地。团长因病请假，谭师长命他代行团长职务，在水口，与来犯的蒋介石军队展开激战，坚持了数昼夜，撕杀至剩下百余人，又处于粮尽弹绝之中，遂突围而出。在通缉令四布之下，他从香港回到广州。在香港与谭启秀挥泪话别时，为有志报国难酬而

长叹。当时，陈济棠将军主持广东省军政，对独夫蒋介石所为极为不满，于是收编了他及他的同伴，进入燕塘军校将校班再学习。学习结束后，两广反蒋抗日运动兴起，他奉命领兵驻守粤北韶关。卒因粤方空军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变，高级将领余汉谋又倒戈，陈济棠被迫下野，在广东难于立足，乃折道回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40年，他出任广州湾谍报分处主任，专司观测和监视敌人舰艇及空军活动情况。未几，又去职。此后靠寻找文职谋生，后在贺县八步半官半商的粮食机关供职，直至解放。

1988年春节后，这位我县最老的农民政协委员病逝于广东省佛山市，终年88岁。